

## 第二章 冷戰時期中共的安全觀及其軍事戰略

安全觀是安全環境和安全合作關係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是制定國家安全的重要依據，不同的安全觀念必然會產出不同的國家安全戰略，並對該國的建軍備戰產生直接影響。本章將探討中共建政後，其國家領導人的安全觀，並如何反映在其軍事戰略上。首先探究國家安全的內涵為何？

### 第一節 國家安全的內涵

國家安全是任何一個國家致力於生存發展、國家利益與價值之維護，以及保障國民免於威脅所必須面對的課題。故首先要瞭解國家安全的涵義與範疇，其次是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及安全的威脅層面。

#### 壹、安全定義

安全是人類追求的基本目標之一，無論是個人、家族、社會、以致於國家，到現代已擴大至整個世界，都離不開安全。那何謂是「安全」呢？目前學術界對「安全」概念的界定仍然沒有定論。<sup>1</sup>中國大陸商務印書館 1994 年版的現代漢語辭典對「安全」的解釋是：沒有危險、不受威嚇，以及不出事故。這種解釋仍相當抽象，但若與「危險」相連，可以感受到「安全」是指一種狀態。西方的《韋伯詞典》對安全的解釋為一方面指安全的狀態（指免於危險、沒有恐懼），另一方面還有維護安全的含義（指安全措施和安全機構）。<sup>2</sup>另一西方學者沃佛（Arnold Wolfers）認為「安全」在客觀意義上，是指不存在對既有價值觀的威脅（the absence of threats to acquired values），在主觀意義上，是指不需顧慮此種價值觀會遭受攻擊（the absence of fear that such values will be attacked）。<sup>3</sup>因此，可以說「安全」在概念上是與「威脅」和「危險」連繫的，它既是一種主觀的感覺，又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在客觀上不存在威脅，主觀上不存在恐懼的具體表現。

#### 貳、國家安全的涵義與範疇

「國家安全」為國家生存與發展之保障，但「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這個名詞最早是出現於美國學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 1943 年的著作《美國的外交政策》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國際政治中常用的名詞，也開始對國家安全作學術上的研究。<sup>4</sup>什麼是「國家安全」卻是一個複雜的概念，涉及的內

<sup>1</sup> 劉復國，〈綜合性安全與國家安全亞太安全概念適用性之檢討〉，《問題與研究》，38 卷 2 期（民國 88 年 2 月），頁 24。

<sup>2</sup> 李寶俊，〈中國新安全觀的提出及其主要內容〉，《中國外交》，2001 年 7 月，頁 14。

<sup>3</sup> Arnold Wolfers, "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67, No.4 (December 1952), p. 481.

<sup>4</sup> 李寶俊，前揭文，頁 14。

容極為廣泛，舉凡領土、主權、外交、軍事、政治制度、傳統生活方式、經濟、內外環境等因素，均與國家安全有關。以下歸納一些學者對於國家安全所下的定義：

表 2-1 學者對國家安全定義歸納表

學 者	主 張 內 容
克勞德 (Inis L. Claude)	國家安全是指一個個別國家的安全，意味著一個國家有生存的能力、維護其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並保持其所致力之價值體系不受外來的干預。安全表示沒有輸掉一場戰爭的危險，亦意味著沒有需要進行一場戰爭的危險，更包括沒有不能一戰的危險。國家安全不是指完全沒有外來的威脅，但要求在應付威脅時不必付出太大的代價。
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一個國家是否安全，在於不必犧牲他的核心價值，以達到避免戰爭的目的；若遭受到挑戰，則能在戰爭中獲勝以維持其核心價值，即為安全。
布朗（美國前國防部長） (Harold Brown)	國家安全是一種保存國家物質和領土完整，在合理條件上維持其與世界其餘部分之間的經濟關係；保護其性質、制度和統治不受外力擾亂，以及控制其國界的能力。
潘得福與林肯 (Norman J. Padelford and George A. Lincoln)	認為國家安全有三種意義：一、保障國家生存、獨立與領土完整，不受外力的干涉。二、保存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三、維持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
加彭 (Jules Cambon)	認為國家安全不僅在維持海內領土之完整，並使世界敬仰本國人民；不僅在維持本國經濟利益，並維持足使國家能夠榮耀生存於宇宙之間的一切事項。

資料來源：

- 1、John Norton Moore, Frederick S. Tipson, and Robert F. Turnet (eds.) *National Security Law* (Durhan: Carolian Academic press, 1990), p. 31.
- 2、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48.
- 3、台灣研究基金會編輯部，《國防白皮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7月)，頁8。
- 4、Norman J. Padelford and George A. Lincol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Press. 1954), pp. 289—290.

從以上這些學者對國家安全定義的分析，可以說，國家安全傳統的定義多偏向軍事安全意涵，是指免於受到外敵壓迫和威脅。從戰略觀點看，國家安全是「對所有外來侵略、間諜活動、敵意偵察、破壞、顛覆、困擾及其他敵意影響等國家所採取之保護」。<sup>5</sup>沃佛（Arnold Wolfers）認為國家安全是一個模糊的象徵

<sup>5</sup> 柯林斯（John M. Collins），《大戰略》，鈕先鍾譯，（台北：黎明，民國64年6月），頁455。

(ambiguous symbol)，<sup>6</sup>而且可能根本就不具有任何精確的意義。我們除了思考戰爭的威脅，以維繫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外，也必須兼顧國際安全的走向。所以，國家安全是「在創造有利於保持或擴大國家最終價值的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環境，以對抗現存或潛在的威脅，國家安全即是此政策的一部分」。<sup>7</sup>是故，可以瞭解國家安全應以威脅考量為起點，兼顧所有的軍事層面和非軍事層面，運用武力和非武力的方式來達成國家安全的目標。因此國家安全並非是一種靜止的狀態，而是受不斷變化的國內環境與國際環境的影響，其主要功能在於抵抗威脅，目的在於保護國家核心價值與利益，以維持國家的生存。

是故，具體而言，國家安全又可解析成下列五個涵義：<sup>8</sup>

- 一、國家生存不受威脅，這是國家安全的基本涵義。
- 二、國家領土完整，不受任何侵犯。
- 三、政治獨立和主權完整，維持政府運作和國家發展。
- 四、維持經濟制度及發展的正常。
- 五、確保國民傳統生活方式，不受外力干涉與控制。

因為威脅國家安全因素的複雜性和普遍性，造成國家安全的範圍涵蓋面包括軍事、政治、經濟、科技、金融、文化等各層面。然而最基本的要素是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經濟安全在現代國家安全中已佔核心地位，沒有經濟安全的軍事安全，最終帶來的是國家不安全。但經濟安全有時必須以軍事力量為後盾，故冷戰結束後，美國已失去了軍事威脅的對手，但仍編列高額國防預算，研發許多軍事開發計劃項目，如 NMD 和 TMD 計畫等超大型發展計劃。其原因是，迄今為止軍事力量一直是人類社會實踐中所面臨困難的最大需求。

就國家安全概念的研究層次而言，基本上產生了多面向的擴展現象。一方面安全概念從國家層次向下延伸到個人所關切的議題，相對的亦由國家向上發展到國際體系的安全；另一方面研究的範疇則從軍事層面擴伸到政治、經濟、科技、社會、環境及人類等領域；而在政治責任方面，則由傳統的國家中心論發展到區域、地方政府，以及國際制度與非政府組織、新聞界、抽象的自然界與市場等領域。因此，安全範圍不斷延伸，發展成形的有國際安全、全球安全、區域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綜合性安全等新觀念。

### 參、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

威脅國家安全的因素幾乎是無所不在的，曾任美國國務卿的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說過一句名言：「假使某一國家居然獲得絕對安全，則所有其他國家

<sup>6</sup>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47.

<sup>7</sup>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 17.

<sup>8</sup> 台灣大學軍訓教官室，《國家安全概論》，(台北：台灣大學軍訓教官室)，頁 15。

都會感到絕對不安全」。<sup>9</sup>從歷史上觀察也發現，不論強權或小國，都不可能得到所謂「永久的絕對安全」，然而隨著國際政治多元化，軍事力量已不再是威脅國家安全的唯一來源，凡是可能影響國家主權行使、政治制度、傳統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國家賴以生存的一切有形、無形力量，皆可視為國家安全威脅，那麼一般威脅國家安全的因素何在？簡單條列區分如下：<sup>10</sup>

- 一、來自傳統的敵對者：如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世仇，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歷史宿怨。
  - 二、侵略性的意識形態：如歷史上的宗教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日本及義大利。
  - 三、領土擴張政策：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日本及 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 四、鄰國之間戰力相差懸殊：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中國與日本，及 1990 年時的科威特與伊拉克。
  - 五、友好國家的日趨不安和衰落：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奧同盟，將德國捲入戰火。
  - 六、來自其他國家的衝突：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奧國及塞爾維亞衝突，導致世界大戰的爆發。
  - 七、政府的錯誤政策與執行：如美國介入越戰。
  - 八、恐怖主義活動：基於某種政治目的，採用非戰爭的暴力手段所進行的活動。
  - 九、社會變遷的失控，如新國家建立後的整合（integration）、認同（identity）和統一過程，所產生的暴動、內戰及各種價值、利益和政權的非法爭奪等。
- 其他如爭奪經濟市場、地緣上的戰略要點、政治腐敗，民意機關各黨派勢力或利益不能妥協，都可能威脅國家安全。

## 肆、安全的威脅層面

國家安全政策大部分是在國際環境中對認知的威脅所作之回應。所以安全不只是對本身力量及弱點之評估，也是對認知中威脅的意圖及能力的評估。<sup>11</sup>而威脅的程度則視潛在敵人的意圖及能力而定。傳統認為，安全是基於兩個基礎之上。首先，大多數對國家安全形成的威脅是來自於國境之外。其次，這些威脅主要是以軍事為內涵，面臨此種威脅的國家，也應採取軍事的回應。

然而，這樣的看法從冷戰時期開始漸漸有了變化。特別是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各國或地區面臨的直接外部威脅下降，傳統國家安全的內涵與性質也相對產生變化。影響安全的角色既有國家的，也有非國家的。安全威脅的來源更為多樣，包括國家外部和國家或地區內部。保障安全的手

<sup>9</sup> 台灣研究基金會編輯部，《國防白皮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 年 7 月），頁 18。

<sup>10</sup> 同註 8，頁 16—17。

<sup>11</sup> Daniel J. Kaufman, Jeffrey S. Mckitrick and Thomas J. Leney, *U.S. National Securit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nada: Lexington Books, 1985) ,p. 1.

段已不止於軍事方面。因安全威脅的因素增加，故曼道爾（Robert Mande）認為，除非威脅直接危及一個政府、其人民或其國家生活方式的全面生存，否則不應成爲國家的安全威脅。<sup>12</sup>

依據現今國際關係學者對安全問題的研究看法，冷戰後安全問題至少應考慮到軍事、政治、經濟及環境等四個面向。

### 一、軍事威脅

軍事威脅一向是國家安全研究中最重要課題。因此，對於國家而言，抵禦外在的軍事威脅之最大任務在於保護國家領土、主權與人民生活與福祉。在此一前提下，國家建立武裝力量回應此種威脅。軍事威脅的形式不一，其中最極端的作法是爲了消滅一個國家所做的入侵和佔領行動。此外，軍事威脅的作用也可以是間接的，其目標不在於國家本身，而是其外在利益，例如離間該國與盟國的關係，或是威脅一國的對海外海運航道，或是斷絕其原油供應管道等。

### 二、政治威脅

軍事威脅通常都帶有政治目的（佔領敵國領土，改變其政府制度，控制其政策或行爲），但是有些政治目的也可以藉由政治威脅的方法來達成。由於國家在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實體，因此政治威脅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危險程度並不下於軍事行動，而這種情況特別容易發生在內部人民對於國家信念與制度本來就存有爭議的國家。這些國家在面對外來勢力的政治滲透時會呈現高度的脆弱性。政治威脅主要是源於無政府的國際社會所造成的思想、資訊和傳統的衝突。<sup>13</sup>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進行政治干預是比較可以觀察到的威脅，例如支持一國內部的分離運動或培植反對勢力。不過此類行動是緣於外來勢力的策動，或是原本一國內部種族或政治矛盾的擴散，則是一項難以區分的問題。

### 三、經濟威脅

在經濟領域中，國家並不是唯一的行爲者，而只是所有參與的行爲者之一，而且國家在經濟方面的責任與利益並不如政治與軍事方面明確。因此，要形成國家安全的經濟威脅必須具備二個條件。第一，會對國家軍事能力造成影響。經濟與財富是支持一個國家平時進行軍事整備，及戰時能持續發揮戰力的重要憑藉。更精確地說，軍事能力乃是依賴外來的重要戰略物資的持續供應，因此威脅這種物資的安全供應都被視爲國家安全的威脅。第二，將對國內穩定造成威脅。現代國家都採取藉著擴展貿易追求財富極大化的經濟策略，造成高度依賴貿易來追求繁榮，維持社會結構的穩定。

學者李瓊莉認爲，當社會及政治結構有賴持續的經濟成長才得以維持，國內政治穩定很可能會因爲外來因素所造成經濟表現不佳而遭到破壞。因此，當經濟問題的外部效應威脅一國的國家凝聚力、社會福祉、政權合法性或其國際地位

<sup>12</sup> Robert Mande, *The Changing Face of National Security: A Conceptual Analysi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4), p. 22.

<sup>13</sup>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 77.

時，皆被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sup>14</sup>

#### 四、環境威脅

傳統上，生態上的威脅被視為自然現象，而非國家安全所關心的課題。諸如：地震、洪水、暴風、乾旱等自然災害可能會對一個國家造成像戰爭規模般的傷害，但是隨著人類活動規模的擴大、速度的增長，一個國家的生態威脅很可能是來自他國。工業國家所造成的臭氧層薄化與溫室效應無可避免地威脅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不過執政者對環境問題的關切程度並不如其他形式的威脅，除了其成因隱而不見之外，更重要的是欠缺威脅國家生存的迫切性。相較於軍事與政治安全呈現的立即與明顯威脅，需要長時間累積方能顯現效果的环境威脅，在政策處理過程中自然不被國家執政者列為優先考量的因素。

安全的考量層面雖有軍事、政治、經濟、環境等四大層面，不過要形成安全的威脅，則必須有急迫性及促使國家採取對策的特徵。此外，安全的目的在於維護國家的生存。在此一前題下，國家會對威脅國家安全的對象採取對策。且國家平時應維持一定的機制以因應威脅發生，例如建立一支武裝力量，抵抗可能的外來侵略，成立警察來維持國內治安，中央銀行調節國家經濟金融活動等。

在冷戰時期，軍事威脅是國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脅來源，對應之道就是加強本國的軍事實力。但對於威脅的認知是如何認定，民主國家除領導精英外，還受社會大眾之影響來感受外在威脅，但集權國家則由領導階層來決定。中共建政迄 1989 年間重要政策的制定，可說都由毛澤東、鄧小平拍板定案，換言之，即是由毛、鄧個人的認知，即決定政策的走向。

## 第二節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安全觀

為因應軍事威脅，必須建軍備戰，故一個國家軍事戰略的形成，往往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包含國內外環境的因素、歷史的經驗及戰略文化因素。因歷史的經驗及戰略文化因素是一樣的，所以，軍事戰略的轉變是因為國內外環境的改變。那環境的改變在主觀上由誰來認定呢？從政策權力運作的角度來看，中共「決策過程」(Policy process)的研究中，學者許志嘉提出三種模式：「領袖主導」、「領導集體」及「官僚組織」等三種。<sup>15</sup>中共前外交官陸寧認為，中共政治體系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高度的集權，特別是外交、軍事及黨組織人事等方面，長久以來被視為最敏感的領域，這些議題的決策權就更為集中。在此高度集中的決策運作過程中，位階愈高，擁有的決策權威愈高，最高領導人及領導核心班子 (the paramount leader and leadership nuclear circle) 擁有最高權威，中共歷

<sup>14</sup> 李瓊莉，〈經濟安全概念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問題與研究》，38 卷 2 期（民國 88 年 2 月），頁 41。

<sup>15</sup>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台北：水牛出版社，2000 年 4 月 20 日），頁序 2。

史上的最高領導人分別為毛澤東與鄧小平。<sup>16</sup>不同的決策者對相同的狀況，決策的結果會有所不同，主要是決策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及價值信念產生了認知失誤、情感偏見及認知偏差。<sup>17</sup>

會影響領導人的國家安全認知，主要的因素有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國際環境及歷史經驗。首先探討中國的地理環境，拿破崙曾經說過，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決定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同樣的，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決定一個國家的安全環境。<sup>18</sup>故國家所處地理環境，對國家領導人安全觀有絕對的影響。

## 壹、中國客觀地理環境及地緣政治形勢之特徵

位於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北起黑龍江、南至曾母暗沙，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至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匯合處。陸地面積達 9,571,300 平方公里，海域面積 300 多萬平方公里，陸、海總面積居全球第四位。陸界長達 2 萬多公里，與北韓、越南、寮國、緬甸、印度、不丹、錫金、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俄羅斯及蒙古接壤。大陸海岸線長 1.8 萬多公里，東隔黃海、東海與南韓、日本遙遙相望，南隔南海與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相望。沿海島嶼 6,500 多個，全國人口約 13 億，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首都位於北京，上海為全國最大城市及商業中心。<sup>19</sup>

因中國所居之地理位置，在地緣政治形勢上所形成之特徵如下：<sup>20</sup>

- 一、中國是邊界線較長，相鄰國家最多的國家之一：與中國有共同陸地邊界的國家共有 15 個，隔黃海、東海及南海相望有 7 個，與中國未有共同邊界與海疆但與中國的關係素來比較密切的國家有柬埔寨、泰國、孟加拉等。比起其他大國，除俄羅斯外，美、日、印度、印尼、英、法、德沒有一個國家的邊境形勢比中國複雜且具威脅性。
- 二、周邊國家的人口眾多，且政治制度及經濟發展差距很大：中國周邊國家擁有人口的大國有印度、俄羅斯、日本、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目前人口均超過上億人。此外越南、菲律賓、泰國、韓國和緬甸等國的人口目前也有 4000—7000 萬。它們和中國的人口加起來，達 30 多億，佔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這一地區也是政治制度差別很大的地區，中共、越南、北韓、寮國等 4 個國家為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日本被視為西方國家，俄羅斯和中亞地區等過去為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則正處於過渡時期，其他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富國與窮國都有，既有世界最富的國家如日本，也有最窮的國家如寮國、柬埔寨、

<sup>16</sup> 許志嘉，前揭書，頁 11。

<sup>17</sup> Joshua S. Goldstein，《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歐信宏、胡祖慶合譯（台北：雙葉書廊，2003 年 7 月），頁 147—148。

<sup>18</sup> 朱聽昌，《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2—3。

<sup>19</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http://zh.wikipedia.org/wiki>。簡稱「中國」，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我方稱呼為「中共」。

<sup>20</sup> 葉自成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19—22。

緬甸、蒙古、孟加拉等，而新加坡、南韓、馬來西亞、泰國等則為新興發展中國家。

三、中國周邊地區是世界上大國最集中的地區：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大國或對中國有直接影響的大國計有俄羅斯、日本、印度、印尼及美國：

- (一) 俄羅斯：土地面積世界最大，天然資源豐富，與中國有 4300 多公里的陸地邊界線，雖目前綜合國力不強，但擁有大量尖端科技武器及核子武器，從過去、現在及未來都是中國在地緣政治上應當考慮的重要因素。
- (二) 日本：是一個經濟大國，經濟實力僅次於美國，與中國有著歷史文化和經濟密切的關係，又是一個曾經對中國進行過侵略且目前沒有明確反省的國家。且具有發展核子武器巨大潛力的國家。近年來積極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甚至對軍事大國的地位也未完全放棄。
- (三) 印度：是次於中國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和人口最多國家，也是南亞最大的國家，其政治、經濟、軍事潛力很大。
- (四) 印尼：有近兩億的人口，而且近幾年經濟發展也很迅速，其在東南亞的地位不斷提升。
- (五) 美國：與中國沒有直接地緣關係，但其自認為世界領導國家，在東亞有很重大的戰略利益，因此對東亞地區一直不斷進行干涉，對中國的許多近鄰國家和近海國家都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未來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是中國地緣政治決不能忽視的一個因素。

因此，在當今世界上發揮主要作用的國家和地區中，除了西歐與中國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因素外，世界其他大國和準大國，都是中國地緣政治必須要考慮的因素。上述是中共地緣政治的現況，但毛澤東時代，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及俄羅斯均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蒙古也在蘇聯的保護下，可說中共的北方和西北方都與蘇聯接壤，是中共邊境線接壤最長的國家，也是對中共影響最大的國家。

## 貳、毛澤東的安全觀

毛澤東從中共建政後迄 1976 年過世止，均為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其個人對世局的認知影響中共的對外戰略及軍事戰略。在其主政期間，對國家安全的認知概可區分三個階段。

### 一、1949 年至 50 年代末期

中共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政時，國內形勢經過八年的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造成民生凋敝，大批工廠停工，大量工人失業，農業受損嚴重，災民流離失所。據中共有關資料統計，同解放前最好年度相比，1949 年的鋼鐵產量由 92.3 萬噸下降至 15.8 萬噸，下降約 82.9%；煤炭由 6188 萬噸降至 3243 萬噸，下降約 47.6%；糧食由 2774 億斤降至 2162 億斤，下降約 22.1%；棉花由 1698 萬擔降至 889 萬擔，下降約 47.6%；工農業總產值由 688.9 億元降至 466.1 億元，下降約 32.3%，



其中工業產值由 280.6 億元降至 140.2 億元，下降約 50%；農業由 408.3 億元降至 325.9 億元，下降約 20%。<sup>21</sup>

在國際局勢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雅爾達會議後，國際格局已形成美蘇兩大集團，即所謂的雅爾達體系。<sup>22</sup>戰後美、蘇立即擴大及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形成了兩極對抗，進入了我們所稱的冷戰時期。故中共建政後，毛澤東面臨三種對外的選擇：與美國友好疏遠蘇聯、在美蘇間保持中立、與蘇聯結盟對抗美國。<sup>23</sup>經分析：<sup>24</sup>

- 第一、中共建政時，美、蘇冷戰已開始，且美、蘇兩大陣營在世界上正爭奪勢力範圍。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具有極大的軍事與經濟潛力的大國，美、蘇兩大陣營不會同意中國保持中立，而是極力將之拉入自己的陣營。
- 第二、中國剛經歷過八年的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國力很弱。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及增強國力和保護國家安全，都有賴於外部大國的支持與幫助。因此，中國或求助於美國及其西方盟國，或求助於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也就是說當時中國沒有自給自足和不結盟的本錢。
- 第三、在領導人主觀認識上，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對國際局勢的認識與蘇聯是一致的，都認為在美、蘇兩大陣營的對抗局面，世界上的國家只能在兩個陣營之中作選擇，中立或騎牆是不行的。
- 第四、蘇聯領導人史達林高估國民政府的實力，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再敦促中共與國民政府和談。等到中共佔領中國大陸，建立政權後，史達林擔心毛共政權會同南斯拉夫狄托政權一樣，與蘇聯分道揚鑣，損及蘇聯在遠東的利益。<sup>25</sup>
- 第五、由於美國採取「圍堵政策」對抗共產集團，且支持國民政府，不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1950 年韓戰爆發，美軍一度打到鴨綠江邊，中共認為已威脅到中國東北的安全，故出兵協助北韓對抗美國聯軍。同時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並於 1954 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因此，美國成為中共國家安全威脅的最大敵人，且在相當長期的一段時間，彼此處於相互敵視及隔絕的狀態。

毛澤東根據以上對國際局勢的分析，為維護中共的國家利益與安全，當務之急為：第一、鞏固對中國大陸的全面控制，確保自身安全；第二、推行社會主義改造計劃並推動經濟發展。<sup>26</sup>因此，就安全言，政權初創的中共仍受退居台灣的

<sup>21</sup> 廖國良、李士順、徐焰著，《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458—459。

<sup>22</sup> 劉德喜，《外交方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1。

<sup>23</sup> 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3。

<sup>24</sup> 同上註，頁 4—7。

<sup>25</sup> 曲星，〈蘇聯在新中國建國前後的對華政策〉，《國際共運》，1986 年第 6 期，頁 1—9。及余湛、張光佑，〈關於史達林曾否勸阻我渡江的探討〉，《黨的文獻》，1989 年第 1 期，頁 56—58。

<sup>26</sup> 潘錫堂，《中共十二大後的對蘇聯外交政策》（台北：山遠出版社，1987 年 3 月），頁 36。

中華民國軍隊及美國的軍事威脅，就推行社會主義改造計劃與推動經濟發展言，需要外來的資金與技術，特別是共產黨陣營的援助。於是採取對蘇聯的「一邊倒」政策。希望在蘇聯的保護及協助下，實施國家建設。<sup>27</sup>

## 二、60年代

毛澤東為加速經濟建設步伐，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毛澤東於1958年發動了「三面紅旗」的大躍進運動，在全中國大陸農村推行人民公社，由於經濟上盲目躍進，勞民傷財而又得不償失，全國數億農民放開肚皮吃飯，再加上天然災害及蘇聯斷絕援助，結果造成經濟上的緊張形勢，出現三年嚴重困難時期(1960年—1962年)。當時農產品和鋼鐵產量大幅度下降，全國物價上漲，貨幣貶值，糧、油、副食品、棉布和各種日用品奇缺，一切物資都嚴格實行低額定量配給供應，以致餓殍遍野。由於饑荒而死亡的人數，有的估計三千萬，有的認為至少在一千萬以上，不過至今未見公佈準確數字。<sup>28</sup>三面紅旗的失敗，使毛澤東失去了國家主席之位，因此毛逐漸把精力轉移到政治鬥爭，使經濟建設讓位於階級鬥爭。毛澤東希望用政治掛帥來推動經濟建設，結果，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並沒有使「燦爛的政治之花」結出豐碩的「經濟之果」，反而使中共的綜合國力下降，人民的生活水準降低，幾陷國家於危亡之地。<sup>29</sup>

1958年前後國際局勢與中(共)蘇關係產生了一些變化，中(共)蘇之間因意識形態與對西方陣營的路線看法分歧，彼此在利益與安全上起了摩擦，特別是1956年毛澤東對赫魯雪夫(Nikita S. Khrushchev)於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存」路線有極大的不滿與質疑。<sup>30</sup>1957年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sputnik」試射成功，毛澤東認為這是「東風壓倒西風」，<sup>31</sup>主張共產集團應該利用此種技術優勢發動全球性的民族解放戰爭，但不為蘇聯所接受。且赫魯雪夫提出的「和平共存」路線，讓中共質疑所謂的「和平共存」乃是美、蘇之間的和平共存，但不意味中共也能與美國和平共存，如此將使中共獨自面對美國的威脅，也意味著若中共與美國衝突時，蘇聯可能不會擔負起對中共的安全義務。為了試探蘇聯，1958年8月23日中共發起「八二三砲戰」。<sup>32</sup>「八二三砲戰」爆發後，中華民國國軍的英勇表現，讓共軍無法越雷池一步，且迎頭痛擊共軍。此期間美國堅決支持中華民國，其總統艾森豪曾表示必要時將使用核子武器。<sup>33</sup>而赫魯雪夫竟沒有反應，而使毛澤東碰了一鼻子灰，中蘇共關係更加惡化，所以毛澤東實際上同蘇聯鬧翻是在1958年。<sup>34</sup>

<sup>27</sup> 張鳳霞，〈毛澤東、鄧小平國家安全觀之比較研究〉，《吉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卷3期（2001年9月），頁3。

<sup>28</sup> <http://www.china10k.com/trad/history/6/64/64f/64f01/64f0101.htm>。

<sup>29</sup> 張鳳霞，前揭文，頁5。

<sup>30</sup> 潘錫堂，前揭書，頁37。

<sup>31</sup>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6.

<sup>32</sup> 齊茂吉，〈五〇年代至八〇年代由中共內部政爭探討中共軍事路線之演變〉，（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74年6月），頁112。

<sup>33</sup> Morton H. Halperin, *op. cit.* 轉引齊茂吉，前揭文，頁112。

<sup>34</sup> 呂狀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的國防戰略思想〉，收錄於周承恩、鄭謙主編，《毛澤東的

1958年中蘇共間更因「長波電台」<sup>35</sup>和「聯合艦隊」<sup>36</sup>問題，使中（共）蘇兩大國的矛盾更表面化。<sup>37</sup>但當時蘇聯在綿長的中蘇邊境僅有十二個師的兵力，尚不構成威脅。1959年6月蘇聯片面撕毀「關於國防新科技新協定」，1960年7月撤回所有的科技人員，軍經援助全面中止，使毛澤東無法繼續推動軍隊現代化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共原期望蘇聯的軍事支援破滅。<sup>38</sup>1962年中印邊界爆發武裝衝突，蘇聯竟支持印度，<sup>39</sup>使中（共）蘇關係更是雪上加霜。1966年3月蘇共二十三大後，中蘇兩黨間關係完全斷絕。此後，中蘇邊境衝突事件增多，從1964年10月到1969年2月，蘇聯邊防軍在中蘇邊境地區挑起的各種事件達4180餘次。1968年蘇聯揮軍入侵捷克，鎮壓當地所謂「布拉格之春」的民主運動，蘇聯總統布里茲內夫發表宣言，宣稱蘇聯有權干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即我們所稱的布里茲內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使毛澤東認知到蘇聯也可能對中共使用武力。1969年3月中（共）蘇兩國為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歸屬爆發了武裝衝突，事件雖然很快結束，未形成大規模戰爭，但事後雙方均在邊境後方部署重兵與核武。<sup>40</sup>蘇聯部署兵力達40多個師，近百萬地面部隊於中蘇邊界，規模達到蘇聯當時全部軍力的四分之一，中共北方防務產生空前威脅，也加深了毛澤東對爆發全面大戰可能性的看法。<sup>41</sup>

60年代中（共）蘇關係惡化，中（共）美關係也未見好轉。美國仍持續韓戰後對中共的敵視。60年代初美國當時是甘乃迪政府，其政府的主流思想是中共比蘇聯好戰，威脅更大。因中共正處於類似史達林時期蘇聯的發展階段，侵略性很強。<sup>42</sup>而且美國認為中共正在研發核武，一但中共加入核子俱樂部，由於中共的好戰和在核武器使用上與蘇聯的態度不同，中共擁有核武器是很危險的。<sup>43</sup>1962年中南半島上的南、北越軍事衝突持續升溫，美國於1965年3月直接派出地面部隊進入越南參戰，並派出飛機對北越實施轟炸。中共對此事認為已威脅到中共安全，向美國提出嚴重警告。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1965年2月18日在國會秘密作證時曾說：「中共是今天美國的主要敵人」。美國官方明確提出：

---

思想與理論（1956年—1976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元月），頁270。

<sup>35</sup> 「長波電台」事件：1958年4月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寫信給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提議中（共）蘇合資，蘇出七千萬盧布，中共出三千萬盧布，在中共境內建立長波電台，由蘇聯掌握以指揮潛艇活動。中共要求一切費用由中共出，所有權歸中共但雙方共同使用。蘇聯不同意，雙方未達成協議。

<sup>36</sup> 「聯合艦隊」事件：1958年7月蘇聯駐中共大使尤金向中共提出由中共出人及基地，蘇聯出裝備，並由蘇聯指揮，建立中蘇聯合艦隊。毛澤東拒絕這種無理要求。

<sup>37</sup>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探討中共軍事路線之演變》（台北：新新聞文化，1997年1月），頁50。

<sup>38</sup> 蘇起，《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台北：三民書局，1992年），頁220。

<sup>39</sup> 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1月），頁40。

<sup>40</sup> 潘錫堂，前揭書，頁105。

<sup>41</sup>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72.

<sup>42</sup>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23.

張小明，《喬治·凱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版），頁63—64。

<sup>43</sup>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p. 1291.

「美國全球戰略最關注的問題是對付中共」。<sup>44</sup>毛澤東對美國在越南的升高戰爭的行為反應是強烈的，於當年 4 月 12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加強戰備工作的指示。

60 年代是中（共）蘇、中（共）美關係均惡劣的時代，在軍事安全方面被美蘇兩國包圍了，中共對外戰略遂由「一邊倒」轉向「反帝、反修」或「兩條戰線」，且在外交上採取革命輸出，因此在外交上也被國際社會所孤立，這個時期同中共建交僅有一個葉門民主人民共和國（1968 年 1 月建交）。所以中共在國內建設方面改為國防建設優先，準備遂行戰爭。這個時期是中共建政後最黑暗的內憂外患時期，對國家安全危害十分嚴重，究其原因，依中共學者分析，有以下三點：<sup>45</sup>

第一、這是中共在國內以「階級鬥爭為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向外延伸的結果。在國內「打倒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搞唯我獨革，打擊一大片；向國外延伸，就是「打倒帝、修、反」，到處樹敵而被孤立。

第二、毛澤東對世局的判斷不正確，毛認為「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結果國際上並沒有出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勢，第三世界國家也在拼命發展經濟，結果使得對外戰略及對內政策指導出現錯誤。

第三、林彪、江青等利用毛澤東理論與實踐上的錯誤，造成政府失序、社會混亂、民生凋敝，並被世界所孤立。

### 三、70 年代初至毛澤東死亡（1976 年 9 月 9 日）

60 年代末期，中共國內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造成政府失序、社會混亂、民生凋敝。1969 年毛澤東鑑於林彪的激進與軍人的擅權，極欲重建文人對國家行政的控制，並企圖削減林彪的權力，在此刺激下，林彪遂於 1971 年刺殺毛澤東，陰謀奪權，結果失敗。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授權下，出面挽救中共內部的危機。<sup>46</sup>

在國際局勢上也出現了變化，美國自從 1965 年大量介入越戰，結果造成國內經濟衰退，人民反戰聲浪日愈高漲，對美國政府形成莫大的壓力。1967 年尼克森在美國的《外交季刊》發表了一篇名為〈越戰後的亞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話「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共留在國際大家庭外」。這篇文章被毛澤東看到，並交周恩來等人閱讀。毛認為若尼克森能當選美國總統，可能會改變對中共的政策。<sup>47</sup>

60 年代末期，中共兩面受敵，毛澤東思索如何突破困境，他委請葉劍英、陳毅、徐向前和聶榮臻四位元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對國際局勢實施研究，並提

<sup>44</sup> 呂狀羽，前揭文，頁 278。

<sup>45</sup> 劉山、薛君度主編，前揭書，頁 43—44。

<sup>46</sup> 詳細內容參閱：齊茂吉，〈50 年代至 80 年代由中共內部政爭探討中共軍事路線之演變〉，（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74 年 6 月），頁 151—186。

<sup>47</sup> 劉山、薛君度主編，前揭書，頁 259。

出四份報告，要點如下：<sup>48</sup>

第一、從中（共）、蘇、美大三角關係的觀點來看，美、蘇雙方針鋒相對，真正現實的利害矛盾還在美、蘇之間。因此，美國、蘇聯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不高。

第二、研判美國的戰略重心在西方，視中共為潛在的威脅。而蘇聯把中共當成主要的敵人，對中共的國家安全威脅比美國大。

第三、建議中共中央選擇有利時機，接受美國關於恢復中（共）美大使級會談的要求。並認為此行動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sup>49</sup>

這四位元帥鑒於中（共）蘇的緊張關係及蘇聯威脅大於美國，主張中共應緩和對美關係，並首度提出聯美抗蘇的建議。<sup>50</sup>

1968年年底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1969年1月就職後，就急於想從越南戰場上脫身，以消除國內的反戰情緒。1969年8月尼克森訪問巴基斯坦時希望巴政府能在中（共）、美之間擔任橋樑；隨後又在羅馬尼亞要求羅國總統向中共轉達美國願意同中共改善關係。<sup>51</sup>從1970年10月開始，尼克森多次表示要訪問中國大陸。當毛澤東確信美國在改變對華政策問題上具有認真態度後，他對美國想積極改善中美關係的信息作了積極的回應。於1971年4月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共。同年7月9至11日季辛吉訪問中國大陸，並宣布尼克森應邀訪問中共。此事件也造成聯合國當年通過「排除中華民國會籍並接納中共」案。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並簽署了中（共）美「上海公報」。中（共）美關係和緩後，中共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也逐漸解凍。這個時期中（共）美的接觸，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國家安全的需求。這也是毛澤東「一條線、一大片」聯美抗蘇的對外戰略。

綜合上述，毛澤東以革命手段，用武力奪取政權，建政時的國際格局已兩極對立，中共處於兩強之間，對於世局的變化非常敏感。毛澤東在1950年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第三次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60年代由於周邊情勢的變化不利中共，遭美、蘇兩面包圍，因而提出第三次大戰迫在眉睫的判斷。毛澤東之所以如此評估，乃是其對時局的判斷仍沿用列寧、史達林關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看法，立足於戰爭與革命。<sup>52</sup>甚至表現在內部的權力鬥爭上。故如中共學者侯樹棟認為「毛澤東時代的安全觀是戰爭與革命」，用「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sup>53</sup>所以迄毛去世時，因應外在安全環境改變，在對外戰略運用上先後有「一邊倒」的傾向蘇聯；「兩條戰線」的聯合中間地帶打倒「帝、修、

<sup>48</sup> 劉山、薛君度主編，前揭書，頁45—46。

<sup>49</sup> 《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頁155—156。

<sup>50</sup> 呂狀羽，前揭文，頁284。

<sup>51</sup> 劉德喜，前揭書，頁6。

<sup>52</sup> 郭華倫，《中共史篇第一冊》（台北：政大國關中心，1982年10月第四版），頁94。

<sup>53</sup> 張明睿，《中共國防戰略發展》（台北：洪葉文化，1998年），頁93。

尹慶耀，《中共外交研究》（台北，民國90年），頁129—130。

反」對抗美、蘇，並推動世界革命；「一條線、一大片」的三個世界理論，聯美抗蘇，爭取第三世界。

### 參、鄧小平的安全觀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過世，中共內部又發生權力鬥爭，當年10月6日華國鋒發動政變打倒四人幫。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鄧小平一切職務，鄧小平以實事求是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理論，打敗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論，而逐漸建立起自己的路線及黨內的領導地位，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至此以後，中共對內對外政策，都有大膽的轉變。而變的目的，基本上是求緩和、減除日益嚴重的蘇聯威脅，盡可能爭取一段和平時間，來彌補毛澤東錯誤路線所造成的創傷，企圖在國內創造安全團結局面，配合國際局勢，爭取國外的資金、設備、科技等一切可能的助力，以求完成在世界權力關係中由絕對劣勢轉變到相對優勢的實力地位的變化，到20世紀末期能成為工農業、國防與科技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sup>54</sup>

毛澤東死後，國際局勢仍舊是美蘇兩強爭霸，70年代美國政府先後歷經尼克森、福特、卡特等三屆政府，當時因越戰關係，造成國內反戰、經濟衰退及國際聲望下降，再加上蘇聯總統布里茲內夫在70年代初期向西方國家放出「和解」信息，美國乃對蘇聯採取「和解」政策。蘇聯則利用此形勢，在國際戰略上採取攻勢作為：

第一、在軍事實力上，蘇聯由劣勢轉為均勢，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優勢：

- (一) 戰略核子武器，1962年在洲際飛彈的彈頭數量，美蘇是10:1的差距；至1972年，蘇聯戰略核武件數已超過美國，總數蘇聯為2227件，美國為2155件。
- (二) 常規軍事力量亦超過美國，依據1978年10月30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對美蘇的常規戰力作了比較：

表 2-2 1978 年美、蘇常規軍力比較表

	美 國	蘇 聯
現役武裝部隊	210 萬人	440 萬人
坦克	10500 輛	50000 輛
作戰飛機	4500 架	4600 架
作戰艦艇	172 艘	240 艘

資料來源：顧關福，《戰後國際關係（1945—2003）》（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8月第2版），頁113。

第二、蘇聯向第三世界發動了規模巨大的擴張攻勢：

<sup>54</sup> 李廉，〈鄧小平外交路線與戰爭危險〉，《問題與研究》，18卷7期（民國68年4月），頁19。

- (一) 建立條約網：從 1971 年至 1981 年的十一年間，蘇聯同埃及、印度、伊拉克、索馬利亞、安哥拉、莫三鼻克、衣索比亞、越南、南葉門、敘利亞和剛果計十二個國家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使這些國家成爲他的勢力範圍。
- (二) 提供大量軍事援助：據 1965 年至 1982 年的統計，蘇聯等對第三世界軍援總額達 447.85 億美元，經濟援助爲 127.62 億美元。70 年代後期蘇聯是世界頭號軍火商，其軍火輸出直接向第三世界擴張。
- (三) 進行代理人戰爭：70 年代蘇聯利用古巴在第三世界打代理人戰爭，由古巴派遣軍隊，蘇聯供應軍火，介入一些國家的內戰，如安哥拉的內戰。
- (四) 1979 年蘇聯直接入侵阿富汗。

到了 1981 年 1 月雷根就任美國總統，爲了重建美國雄風，大幅提升軍費支出，刺激經濟復甦。從 1983 年起美國經濟開始回升，1984 年經濟成長率高達 6.8%，使雷根政府有信心對蘇聯採取強硬措施，在戰略上採攻勢作爲，一面同西歐盟國改善關係，一面擴軍，並在第三世界中用武力遏阻蘇聯擴張。同時發展「星戰計畫」。因 70 年代蘇聯過度擴張，造成軍事工業比重太大，影響經濟發展，因此到 80 年代已沒有能力追隨美國從事太空軍備競賽，迫使蘇聯採取守勢戰略，也使蘇聯的軍事優勢變成經濟上的負債，造成爾後蘇聯的崩解。<sup>55</sup>

以上是美蘇的對抗，中共自認爲第三世界<sup>56</sup>的國家。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過去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並形成一股勢力。<sup>57</sup>1974 年毛澤東與來訪的尚比亞總統卡達翁（Kenneth David Kaunda）談話時，提出三個世界概念，毛說：「美蘇爲第一世界，日本、歐洲爲第二世界，亞非拉爲第三世界。」<sup>58</sup>同年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次會議上發言，公開提出三個世界觀點。<sup>59</sup>中共認爲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在歷史上受壓迫最深，反抗最烈，而且國家數量也最多。因此「第三世界反帝革命力量，可以在長時間內發展壯大有利條件。」<sup>60</sup>因此，鄧小平曾說：「現代中國窮，理所當然屬於第三世界，中國

<sup>55</sup> 顧關福，《戰後國際關係（1945—2003）》（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 年 8 月第 2 版），頁 103—120。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文化，2000 年 3 月），頁 46。

<sup>56</sup> 第三世界：泛指亞非拉和其他地區原處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後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產生的一個新概念，它淵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第三等級。「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是由法國學者、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於 1952 年首先使用，他把戰後新獨立的國家稱爲第三世界。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一些奉行不結盟政策的國家，自稱第三世界。

<sup>57</sup> 滕建群、袁林主編，《世界軍事結—中國軍事專家談 20 世紀軍事演變》（北京：國防大學，2001 年 9 月），頁 79—80。

<sup>58</sup> 《人民日報》，1977 年 11 月 1 日。

<sup>59</sup> 《人民日報》，1974 年 4 月 11 日。

<sup>60</sup> 顧關福，前揭書，頁 339—340。第三世界人口大約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約有 130 個國家。1964 年聯合國爲了開發中國家發展問題，組成了七十七國集團，並與北半球國家展開對話。《人民日報》，1977 年 11 月 1 日。

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命運是共同的，即使中國將來發展富起來，仍然屬於第三世界，中國永遠不會稱霸，永遠不會欺負別人，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sup>61</sup>

鄧小平審視國內外環境因素，認為世局的發展趨勢是「和平與發展」，各國之間的競爭是以經濟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賽。故 1985 年 6 月 4 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曾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外交指導上，概括為兩個轉變。<sup>62</sup>

第一、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得出了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結論。因雙方均擁有可以毀滅對方好幾次的核子武器，即所謂的「恐怖平衡」，因此誰也不敢輕啟戰端。<sup>63</sup>所以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降低，但在第三世界國家間卻因美蘇勢力的介入或意識形態、宗教、領土等糾紛，爆發規模不同和強度不一的各種戰爭和武裝衝突。在 1973 年因以阿衝突，阿拉伯國家以石油當武器，對西方國家採取石油禁運，造成全球經濟下滑。使世人警覺到，除軍事力量外，石油等天然資源可拿來在國際關係中作為行使權力的籌碼。<sup>64</sup>同時也注意到除軍事力量外，經濟因素也會影響國家安全。

第二、改變了過去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條線」戰略，奉行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真正不結盟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

美國雖然大肆渲染蘇聯發動戰爭的危險，但並沒有打算將中共當成真正的盟友。70 年代中共尋求與美國建立「共同反霸」的戰略關係，但美國反認為中共本身沒有力量，在經濟上及軍事上均無足輕重，在全球戰略中是中共有求於美國，而不是美國有求於中共。因此，美國認為只要美國對蘇聯持強硬和對抗政策，則無論美國在台灣或其他問題上怎樣作為，中共也只能忍耐下去。尤其 80 年代初雷根上台後，此種意識成為美國政界相當有影響力的一種觀點。<sup>65</sup>中蘇矛盾在美國的眼中不過是兩個共產黨國家之間的鬥爭，西方國家可以漁翁得利。中共尋求與西方國家建立軍事戰略關係的努力反被美國認為是中共有求於美國，美國並利用這種情況在中美雙邊關係和世界政治中大肆推行自己的霸權主義。這種現象到了 80 年代已經發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這促使中共意識到，在美蘇實力基本平衡、對峙爭霸的格局中，中共作為一個有一定實力的大國，無論與那一方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都有可能打破力量平衡，助長某一方的霸權力量。而中共作為和平力量獨立於兩個超級大國之外，則既對維護世界和平有重要意義，又使兩霸的任一方在

<sup>61</sup> 于成主編，《著作主題集成—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北京：遼寧大學出版，1991 年 4 月 11 版），頁 645。

<sup>62</sup>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頁 126—128。

<sup>63</sup> 曲星，〈80 年代初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收錄於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61。

<sup>64</sup> Frederic S. Pearson、J. Martin Rochester，《國際關係第三版（International Relations）》，胡祖慶譯，（台北：五南圖書，2002 年 1 月），頁 55。

<sup>65</sup> 劉山、薛君度主編，前揭書，頁 62。



處理對華關係時都因擔心把中共「推向對方」而有所收斂。使中共政府從主觀上感到調整對外政策的必要。<sup>66</sup>

中共對外戰略重大調整的目的在於：完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維護世界和平，為中共的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要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安定的國內環境與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不在乎別人說我們什麼，真正在乎的是有一個好的環境來發展自己。」<sup>67</sup>概括地說，調整後的中國對外戰略與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把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首位，堅決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鄧小平說：「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sup>68</sup>

第二、建立和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就提出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同世界各國友好關係的對外政策。

第三、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中共主張：一、在「和平共處五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新秩序。二、新的國際秩序的核心應該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各國不分大小、貧富、強弱，都應該一律平等相待，都有權參與協商解決世界事務，堅決摒棄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由一兩個大國壟斷國際事務的做法；任何國家都不應在世界上或世界某一地區謀求霸權或推行強權。三、必須尊重各國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各國有權根據自己國情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四、各國應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反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問題。五、進一步發揮聯合國的積極作用。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中共主張：一、在平等互利原則基礎上，建立體現公正、合理、相互合作、共同發展的國際經濟關係，徹底改變和摒棄不公正、不平等的國際經濟舊秩序。二、通過南北對話，積極開展互利的南北合作。三、發展中國家要通過「南南合作」，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加強團結，互相學習，共同發展，以「南南合作」推動「南北合作」。四、各國靠各國自己的力量來發展自己，要主動採取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政策，積極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往來。第四、積極推進全方位的對外開放。鄧小平說：「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關閉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sup>69</sup>

綜觀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安全觀，毛終其一生不管世局如何變化，均認定是「革命與戰爭」的安全觀；但鄧接替後，初期國際局勢未有重大變化，鄧小平卻認為

<sup>66</sup> 劉山、薛君度主編，前揭書，頁 59。

<sup>67</sup>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前揭書，頁 360。

<sup>68</sup>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前揭書，頁 3。

<sup>69</sup>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前揭書，頁 117。

世局的趨勢是「和平與發展」。因兩人對世局的看法不同，所以對指導中共軍事戰略的發展亦有所不同。

### 第三節 冷戰時期的軍事戰略

毛澤東在叛亂時期，基於以下四種基本情況：一、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國；二、敵人是強大的；三、中共軍隊是弱小的；四、土地革命。而發展出「人民戰爭」的軍事戰略理論，並奪取了政權。<sup>70</sup>1949年中共建政，因政府初立，統治基礎薄弱，且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仍有相當軍事力量，在蔣中正總統領導下，準備伺機反攻大陸。當時，中國大陸經過八年對日抗戰及緊接其後的國共內戰，經濟凋敝，民不聊生，不具工業基礎，中共不可能獨立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因此仍未放棄人民戰爭的軍事戰略。50年代初的韓戰，使中共體會軍隊必須現代化。毛澤東唯有向蘇聯求助，協助中共軍隊現代化。在此期間中共建軍路線曾出現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之爭，對人民戰爭理論質疑，在時任國防部長彭德懷的主導下，軍隊建設以現代化為主。但50年代末期中(共)蘇交惡，且中(共)美關係未改善，蘇聯於1959年撤出所有軍事顧問及科技專家，使中共軍隊現代化工作受挫。且遭美、蘇兩面包圍，為確保國家安全，又重新強調人民戰爭的軍事戰略思維，到後冷戰時期中共已不提人民戰爭，但人民戰爭思維並未放棄。因時空環境的變化，人民戰爭的軍事戰略內容也跟隨改變，故首先瞭解人民戰爭的涵義，再探討毛、鄧時期人民戰爭的軍事戰略。

#### 壹、人民戰爭的涵義

所謂「人民戰爭」的涵義，就是強調這種戰爭必須在中共的領導下，依靠人民群眾，把廣大人民群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直接地或間接地配合對敵作戰，在組織形式上，實行主力兵團與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與民兵相結合，武裝的群眾與非武裝的群眾相結合。在作戰形式上，採取正規戰與非正規戰相結合，即正規的運動戰與非正規的游擊戰相結合。在鬥爭的形式上，它又是武裝鬥爭與其他各種鬥爭形式相結合，即軍事戰線的鬥爭與政治戰線、經濟戰線、文化戰線的鬥爭相結合的全民戰爭和總體戰爭。因此所謂的「人民戰爭」的本質，乃是毛澤東把群眾路線具體運用到戰爭中去，就是在戰爭中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充分地調動人民群眾的力量進行戰爭。

由以上說明，所謂「人民戰爭」之內涵有二：一是作為戰略方針的「人民戰爭」，也就是所謂「人民戰爭戰略思想」；一是作為戰爭形式的「人民戰爭」，也就是所謂全民戰爭和總體戰爭。

##### 一、作為戰略方針的「人民戰爭」

---

<sup>70</sup> 蔡孝乾，《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之研究》(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民國60年6月)，頁67。

毛澤東認為弱小軍隊對抗強大軍隊，在戰略上必須採取「軍民聯合」和「勞武結合」的方針，才能每戰集中優勢的兵力，對敵人的薄弱部分予以致命打擊。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書中，強調「兵民為勝利之本」，動員廣大的民眾配合軍隊作戰，這樣就可以把敵人「置於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衝入火陣。」又說：「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在論及人民公社時，毛澤東又說：「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而且還要大辦民兵師，這樣，在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時候，就會使他們寸步難行。」<sup>71</sup>所以動員廣大民眾配合軍隊作戰，乃是毛澤東人民戰爭的真諦所在。

## 二、作為戰爭形式的「人民戰爭」

毛澤東基於武力與民眾相結合，戰爭目的與人民利益相關聯的方針，在蘇維埃暴亂時期，<sup>72</sup>以「打土豪、分田地」為誘餌，發動蘇維埃區域農民參戰。抗日戰爭期間，在敵後根據地發動減租減息運動。在全國叛亂時期發動土改鬥爭，使中共所進行的武裝叛亂與民眾緊密地結合起來，使軍隊和民兵結合起來，使正規的運動戰、陣地戰和非正規的游擊戰相結合起來。這種人民戰爭的基本特點，在於不但有人民群眾在軍事上的協力，而且有人民群眾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協力。這種戰爭乃是以人民群眾的「共同作戰」的形式出現，是中共實行不顧人命的「人海戰術」的基礎。

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另一個特點，乃是採取所謂「總體戰」的形式。總體戰爭的概念，就是戰爭同工人鬥爭，同青年、婦女，同一切人民群眾的鬥爭密切地配合起來；同時又同政治的、經濟的、思想以及「肅反」鬥爭等直接地或間接地配合起來，使中共發動的武裝叛亂帶有全民戰爭和總體戰爭的性質。

綜合上述，所謂人民戰爭的基本特點，就是使戰爭與廣大民眾的各種鬥爭相結合，一方面以軍隊的作戰去援助各種群眾鬥爭；另一方面又是用各種群眾的鬥爭（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交通的及軍事等）去配合軍隊作戰。

## 貳、毛澤東時期的軍事戰略

毛澤東時期的國內外環境，可以簡單的規納以下幾點：一、國際間正興起核武戰略而中共正處於美、蘇的中間地帶。二、蘇聯希望與中共軍事同盟的意圖落空，再加上意識形態的分歧，對中共不滿。三、中、蘇邊界衝突與蘇聯的圍堵中共戰略，使中共充滿危機。四、反美、反蘇的雙重敵人，形成戰略的劣勢。五、國內政治的不穩定，造成國力發展的困境。因此，毛時期是面臨生存問題大於發

<sup>71</sup> 傅秋濤，〈全民皆兵〉，《紅旗》，1958年第10期。轉引自蔡孝乾，《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之研究》（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民國60年6月），頁39。

<sup>72</sup> 蘇維埃暴亂時期：民國16年8月國民政府寧（南京）漢（漢口）合作實行清黨反共，中共自8月至12月，先後發動南昌暴動、兩湖秋收暴動、海陸豐暴動、廣州暴動及渭華暴動，均被國軍剿平。共酋朱德、毛澤東率殘部竄入江西省，在瑞金、寧都等地建立根據地，發展游擊武力，形成所謂「中央蘇區」。並於民國20年11月7日，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展問題，所以要隨時隨地準備打仗。<sup>73</sup>故毛澤東提出「早打、大打、打核戰」的看法，在軍事戰略整備上，則一面實施傳統武力的建設，另一方面則全力發展核武力量，為兩條腿的軍事武力建設。

### 一、傳統武力的建構

中共於韓戰後致力軍隊現代化工程，並以陸軍為主的型態發展多元的部隊結構，海空軍分別在 1950 年即已開始建立編制，成長速度非常的快。中共空軍在 1950 年代中期已經擁有四千架戰機，到 1965 年已能仿製米格 17 及製造 F-9 型機；海軍在 1957 年美國的情報單位評估為：中共海軍力量成長，快速驚人，在近代史上中國在遠東海軍中，首次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sup>74</sup>陸軍的數量也一直增加，除傳統步兵部隊外，機械化部隊、砲兵部隊、防空部隊、工程兵部隊等現代化兵種也大量編成。

毛澤東時期的戰略環境為：一、中國貧窮落後。二、共軍裝備落後。三、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四、中國面臨帝國主義的威脅（以美蘇為主要假想敵）。再根據早期戰爭型態、大規模戰爭及核子戰爭之假設。<sup>75</sup>故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指導，是以中國的地理形勢，及眾多的人民群眾，採誘敵深入的人民戰爭。毛澤東認為，人數佔優勢的兵力，結合中國的地理特性，軍事物質特性與中共革命戰爭的經驗，能壓制傳統地面攻擊。故人民戰爭特別強調兵力，因此採全民皆兵。

1955 年中共公布兵役法，採義務役制度。1957 年中共為加強民兵建設，宣佈實施預備役和民兵相結合，建立戰時動員基礎，並使整個中國大陸成為一個完整的戰爭面。1958 年中共推行人民公社運動，採取工農商學兵結合的方針，大辦民兵師，實行全民皆兵和勞武結合的制度。以人民公社為單位，分別建立民兵師、團、營、連等作戰體制，貫徹正規軍建設和民兵建設相結合的構想。<sup>76</sup>

### 二、核子武力建構

人民戰爭與核武嚇阻是扞格不入的，因為毛澤東曾再三強：「武器是戰爭中的重要因素，但決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sup>77</sup>50 年代時期，中共採取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冀望在蘇聯的核子傘的保護下，以人民戰爭的方式來保障本身的安全。因此，中共反覆宣傳「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論調，來貶抑核子武器的恐怖性，同時再三強調「人的因素第一」的理論，來升高人在核子時代戰爭中的重要性。中共領導階層認為，任何對中國的大規模核子攻擊，未必能澈底擊垮中共，因為在核子攻擊後，敵人必將派遣傳統部隊入侵中國大陸，而中共的人民戰爭正是針對這種情況設計的，中共深信「誘敵深入」的持久戰，

<sup>73</sup> 傅仁坤，〈中共軍隊發展及建軍路線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碩士論文，民國 72 年〉，頁 494。

<sup>74</sup> 李坤海譯，〈中共軍事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 年 2 月），頁 61。

<sup>75</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軍事論文集〉（台北：史政編譯局，民國 84 年元月），頁 116。

早期戰爭型態：重武器裝備、編制兵力龐大、機動力強、傳統火力強大、陸戰為主之三軍統合作戰。

大規模戰爭：全民戰爭、全民動員以及全面爆發戰鬥。

核子戰爭：多層次戰略核子、戰術核子、戰場核子。

<sup>76</sup> 傅秋濤，前揭文。

<sup>77</sup>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年 8 月），頁 459。

配合中國大陸廣土眾民的特色，在全民皆兵的動員下，任何攻入中國大陸的敵軍必將重蹈日軍侵華覆轍，葬身汪洋的人海中，中共可獲得最後勝利。

50年代的韓戰經驗顯示，守勢性的人民戰爭無法有效對抗現代化部隊的攻擊，韓戰期間中共損兵折將，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並未打敗美國，祇取得與美國簽訂板門店停戰協定，其中美國的核子威脅也是一項重要因素。據一份美國國務院的解密資料透露，韓戰期間，美國曾一度考慮動用核子武器對付中共。這份文件指出，1953年5月中旬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曾明白表示，假如美軍要使韓戰形勢重大改變，需要使用核子武器對付中共。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認為，獲致軍事突破的唯一途徑就是把核子戰火帶進中國大陸的東北和華北。這份文件又指出，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向中共暗示，美國可能使用戰術核子武器。不久後中共即接受美國杜魯門政府所提的停戰解決方案。<sup>78</sup>停戰協定簽訂後，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這是「迫和」。<sup>79</sup>接著，在1954年至1955年的台海危機中，美國爲了抑制中共軍事冒險，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警告中共，美國準備使用戰術核子武器，來對抗中共的軍事侵略。<sup>80</sup>人民戰爭畢竟是守勢性的，唯有敵人入侵領土後才能與敵人一決雌雄，若敵人僅採取空中攻擊或核子威脅，並不派遣軍隊入侵，中共將無技可施。

由韓戰到台海危機，中共獲得兩項教訓，一是中共雖有龐大的地面傳統武力，在危機時期，核子威攝發揮作用的公算較大。二是即使盟邦蘇聯是核子強權，也不會爲了維護中共利益，爲中共出頭嚇阻美國的核子威脅。<sup>81</sup>毛澤東深知，如果中共要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個強權角色，中共必須要擁有核子武器，以免未來再發生危機，中共將再次受制於美國或蘇聯。<sup>82</sup>所以中共在經費相當困難的情況下仍毅然決然的發展核武，在60年代國民生產總值450億的情況下，以40億開發核子武力。

### 參、鄧小平時期的軍事戰略

1985年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將國防建設從「早打、大打、打核戰」的臨戰狀態，轉到和平時期的建設軌道上，是鄧小平依據國內外形勢所作的決定。<sup>83</sup>鄧小平時期的國內外環境可歸納如下：<sup>84</sup>一、中（共）美關係解凍，中共的主要敵人僅存蘇聯，使中共有較大的戰略空間，維護國家安全。且中共進入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的常任理事國地位，國際影響力日增，中（共）美合作與牽

<sup>78</sup> Harold C.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p. 222.

<sup>79</sup> 毛澤東，〈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頁101。

<sup>80</sup> Harold C.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p. 29.

<sup>81</sup> K. Subrahmanyam, "China's Security Outlook: Past and Future," in *China Report*, VOL. X, NO. 5-6, (September-December, 1974), p. 143.

<sup>82</sup> 中共軍事科學院編，《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130。

<sup>83</sup> 楊得志、宦鄉著，《國防發展戰略思考》（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6月），頁1。

<sup>84</sup> 張明睿，前揭書，頁223—225。

制的機制形成，對中共而言整個國際格局是朝中共有利的趨勢發展。二、由於美蘇的軍備競賽，造成兩國的巨大的負擔，美國在 1985 年時由債權國轉為債務國，而蘇聯發生了經濟危機，到了非改革無以生存的地步。因此兩國改變軍事力的競爭而改採經濟力的競爭。故限制戰略核武談判有了相當進展，核戰機率減低。三、意識形態的衝突逐漸淡化，尤其蘇聯在戈巴契夫上台推動改革，使東西方的意識形態拉近。四、1982 年布里茲內夫在塔什干發表講話，希望與中共重開談判，改善雙方關係，蘇聯並以實際行動表現誠意，兩國又從敵對狀態趨向和平發展。五、文化大革命帶給中共國家不可言喻的傷害，各項建設工作都成倒退現象，不但使中共列於未開發國家，且幾乎是最貧窮的國家，因此在富國強兵的意識下，必須要加緊建設，否則對中共政權將形成挑戰。

鄧小平瞭解國內外情勢後，提出建設中國的構想，認為發展經濟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祇有把經濟搞上去，才能穩定政權，才能在國際上站住腳，才可能有進一步的戰略圖謀。<sup>85</sup>但維護國家安全，軍事仍是主要的力量，故以經濟為發展主軸，鄧仍重視國防建設。但軍事戰略的改變，是依國內外環境而變，且是根據現有條件，逐步完成。鄧小平時期的軍事戰略，概可區分為兩個階段：

#### 一、1977 年至 1985 年

英國的中共問題專家西格爾（Gerald Segal）在分析中共防務時曾指出：從中國的地緣戰略、人文條件及經濟環境來探討，中共不管在防禦核攻擊方面，或是針對任何方向的大舉入侵，都具有先天性的優勢和不易被征服的特點，如再配合上游擊戰術及持久戰略，中共防務所具有的韌性特質，足以抵擋西方可能的入侵。<sup>86</sup>

1977 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當時的軍事安全環境是蘇聯陳兵中蘇邊境的兵力達百萬以上，是蘇聯當時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且配備現代化裝備武器，中共內部對當時中共軍隊所配備的落後武器，是否能在誘敵深入後再以殲滅的戰法產生懷疑。<sup>87</sup>1979 年從全國抽調了 31 個正規師，約 33 萬人，及 1200 輛坦克到西南邊境，發動規模僅次於韓戰的「懲越戰爭」。<sup>88</sup>在作戰過程中暴露出落後的武器裝備及過時的戰略思想，不可能贏得現代化的戰爭。因此中共開始對外國軍事科技、戰爭型態發展及蘇聯軍事威脅下所產生的安全問題進行思考。在當時中共剛啟動四個現代化工程，仍屬於「國窮民貧」階段。

1977 年 8 月 6 日時任中共國防部副部長粟裕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為「毛主席戰爭指導路線的偉大勝利」的文章，指出「我們充分注意發揮現有武器的作用，同時決心自力更生，不斷改善我們的武器裝備，做到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未來的反侵略戰爭是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這是中共第一次出現「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的詞句，也成為鄧小平此階段軍事戰

<sup>85</sup> 趙雲山，《消失中的兩岸》（台北：新新聞出版社，1996 年），頁 352。

<sup>86</sup> 傑拉德·西格爾（Gerald Segal），〈中共防務〉，《中國大陸月刊》，第 24 卷 4 期（民國 80 年 4 月），頁 27—28。

<sup>87</sup> 齊茂吉，前揭文，頁 294。

<sup>88</sup>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48。

略的規劃。

何謂「現代條件」？中共自己的解釋「是指與戰爭有關的經濟、政治、軍事、地理、科學技術諸條件的現況。其中需要著重研究的，一是政治條件，二是技術條件。」<sup>89</sup>其中政治條件是研究分析人民戰爭的時代背景，國際形勢對戰爭的影響，世界各國對戰爭的態度，敵我雙方的政治因素，以及戰爭的發生、發展和結局對國際形勢及敵我雙方的影響。而研究技術條件，是要弄清楚武器裝備隨著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發展的現況和趨勢，及由此而引起的軍隊編制體制、作戰方式和方法的改變。爲了發展經濟，軍事投資經費自然要向下降低，但軍隊要現代化，祇有整編精減軍隊。故鄧小平說：「軍隊要提高戰鬥力，提高工作效率，就必須『消腫』，減少冗員，把省下來的錢用於更新裝備。」<sup>90</sup>在此階段進行二次精減：<sup>91</sup>

(一) 第一次精減：1977 年

此一階段重點在於精減各級機關與直屬單位，以全面消腫爲目標，陸軍爲裁減重點。同時爲強化部隊戰力，增加航空兵、艦艇兵、導彈部隊、電子對抗部隊等兵科員額。

(二) 第二次精減：1980 年

在精減方面：第一是撤銷基建工程兵約 60 萬，並將約 20 萬人改編爲「武警部隊」；第二將 20 萬鐵道兵改由鐵道部管轄。在降格方面：將原來直屬中央軍委的特種兵，如砲兵、裝甲兵、工程兵等予以撤銷，成爲總參謀部下的一級幕僚單位--砲兵部、裝甲兵部、工程兵部。部隊員額由 500 餘萬裁減至 423 萬。

## 二、1985 年至 1990 年

鄧小平對戰爭根源已認知到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貧富差距、南北問題、第三世界勢力崛起、各國經濟關係日趨相互依賴，核武相互嚇阻，使美、蘇均不願以改變他國主權及對方勢力範圍，以免輕啓戰端。基於此變化，鄧小平認爲以往帝國主義剝削與侵略已變成霸權爭奪爲世界動盪的根源。因此鄧小平說：「世界戰爭的危險是存在的 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將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 在較長時間內不會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sup>92</sup>「現在能打仗的還是美蘇，但兩家都不敢動，那一家都有毀滅世界的能力，誰敢動啊？」<sup>92</sup>「世界戰爭的危險是存在的，應該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長將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根據以上這些分析，我們改變了原本認爲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sup>92</sup>因此，在 1985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正式下達指示：國防戰略構想和軍隊建設全面由毛澤東時期「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的臨戰狀態，轉致「和平時期現代化建設」

<sup>89</sup> 左良主編，《戰略學教程》（北京：軍事學院出版社，1985 年 2 月），頁 102。

<sup>90</sup>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27—1997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北京：軍事學院出版社，1997 年 7 月），頁 624。

<sup>91</sup> 謝志淵，〈中共裁軍走精兵之路〉，《中共研究》，第 35 卷 8 期（2001 年 8 月），頁 72。

<sup>92</sup>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前揭書，頁 48。

軌道上。<sup>93</sup>

雖然世界大戰可延緩或避免，但局部戰爭及地區衝突仍不可避免，在戰爭準備上以「局部戰爭」與「低強度衝突」為主，加速現代化、正規化建軍腳步。且希望能「力爭通過威懾力量的客觀存在，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以爭取本（20）世紀內中共社會主義建設可資利用的和平環境。」<sup>94</sup>在優先發展經濟的考量下，在 1985 年中共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鄧小平並宣佈裁軍百萬，主要包括：第一、合併十一大軍區為七大軍區（計有北京、瀋陽、濟南、南京、廣州、成都、蘭州軍區）。第二、精減機構，將原軍事學院、政治學院與後勤學院合併成為國防大學。另外各大軍區、海、空、二砲等單位亦大幅度裁減。裁減下來的陸、海、空部隊改成「武警部隊」，擔任內衛守備任務。部隊員額由 423 萬裁減至 320 萬。<sup>95</sup>

中共考量自己的武器裝備的水準短時間內不可能趕上發達國家，及擁有未來反侵略戰爭有強大的政治優勢與眾多有利條件。<sup>96</sup>故沒有放棄毛澤東的人民戰爭，但戰略方針已不採行誘敵深入的戰法。1980 中共軍事科學院宋時輪寫信給鄧小平，提出考慮國家經濟建設已取得的成就，和國防工程建設也已取得一定規模等情況，不宜再以誘敵深入作為戰略方針，應以積極防禦作為戰略方針。在戰爭初期，以防禦為重點，頂住敵人的戰略突擊，制止敵人長驅直入，穩定戰局掩護全軍的戰略展開，和國家轉入戰時體制。鄧深表同意並採納。<sup>97</sup>因此，在 1985 年中共實施「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中，有計劃地組建預備役部隊，希望提高戰時快速動員能力。<sup>98</sup>雖精簡了常備部隊，但戰時有數量龐大的預備役部隊，仍可有效遂行人民戰爭。

綜合上述，冷戰時期中共軍事戰略之演變，是深受其國家安全觀的影響，當國家安全威脅大時，軍事建設就居於國家建設首位，且國家建設亦以國防需求為依歸。但國家安全不處於立即威脅時，則改以經濟發展為主的和平時期建軍，以軍事力量確保國家經濟的發展。中共在冷戰時期毛、鄧時代的中共軍事戰略發展綜整如表 2-1。

<sup>93</sup>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2 版），頁 87。

<sup>94</sup> Georges Tan Eng Bok, "How Does the PLA Cope with Regional Conflict and Local War?" *China's Military: The PLA in 1990/1991 Kaohsiung*, (Taiwa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991), p. 154.

<sup>95</sup> 謝志淵，前揭文，頁 72。

<sup>96</sup> 蔣順學，〈以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新時期軍事實踐〉，收錄於曾光軍主編《國防思辯論》（北京：長征出版社，1992 年 7 月），頁 283。

<sup>97</sup> 李健，〈縱深打擊正向戰略範圍擴展〉，收錄於曾光軍主編《國防思辯論》（北京：長征出版社，1992 年 7 月），頁 228。

<sup>98</sup>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1927—1997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前揭書，頁 625。



表 2-3 冷戰時期毛、鄧時代的中共軍事戰略發展對照表

論點 時期	戰略環境	軍事戰略	武力建構
毛澤東時期 1945 年 至 1976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一. 中國貧窮落後。</li> <li>二. 共軍裝備落後。</li> <li>三. 戰爭是不可避免的。</li> <li>四. 中共面臨美、蘇帝國主義的威脅。</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一. 人民戰爭：以傳統陸戰為主，誘敵深入，各個擊滅。</li> <li>二. 以劣勢裝備打敗優勢裝備之敵。</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一. 全面戰爭：採全民皆兵制，以陸軍為主。</li> <li>二. 早打、大打、打核戰：發展核武，避免美蘇的核訛詐。</li> </ul>
鄧小平時期 1977 年 至 1990 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一. 世界大戰雖然可以避免，但小規模局部戰爭的發生卻是極有可能。</li> <li>二. 和平可以創造。</li> <li>三. 一切服從於經濟建設之大局。</li> <li>四. 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的威脅仍然存在（以蘇聯為主，但對美國仍不放心）</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一. 進行和平時期建軍。</li> <li>二. 提升綜合國力為國防現代化奠基。</li> <li>三. 走質量建軍：精兵、合成、高效。</li> <li>四. 陸權向海權傾斜同時兼顧空權的發展。</li> <li>五. 堅持積極防禦的現代化戰爭。</li> <li>六. 堅持以劣勝優。</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一. 兩次大規模精減軍隊，實施正規化及現代化建設。期打贏現代條件下的局部戰爭。</li> <li>二. 以海、空軍建設為主。以利積極防禦作為。</li> <li>三. 未放棄人民戰爭加強組建預備役部隊。</li> </ul>

